

土国复兴与中国抗战

王梦杨

一向被人称为亚洲两大病夫的中国和土耳其，在历史上曾遭遇着同一迍邅的命运。其中近东病夫——土耳其，已在十年前发奋为雄，又恢复他在东欧甚至世界上的重要地位，而远东病夫——中国——则尚逗滞留在与病魔——日本军阀——抗斗中。这个艰苦困难的抗斗，到现在已经过三年的时间，本着军事当局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策略来看我们若是向战胜这个病魔，恢复原来的健康，必仍须用相当长的时间，作更伟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神圣的抗战，所以总裁最近昭示我们继续作战三年的计划。在这第三年结束，第四年开始的当儿，正是我检讨过去的成绩，决定将来步骤的时候。我愿意就着土耳其复兴的历史，来检讨，推测和研究我国抗战的工作。

土耳其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在公元十三世纪末，由于突厥首领鄂斯曼(Othmen)的努力，代前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塞尔柱王朝，而建立了鄂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后经过几位英武的国王，如奥罕、摩拉达第一，以及苏力曼大帝等，先后征服马其顿、塞尔维亚、埃及、希腊、东罗马、叙利亚、阿拉伯等地、而成立跨欧、非、亚三洲的空前盛大回教帝国。可是，自从十七世纪末以后，历代的君主，多属弱儒无能，以致宫中后妃和宦官的势力坐大，操纵朝政，政界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军人跋扈，腐败猖獗，不一而足。对外则自与俄国接触以后，西欧列强以近东之地，为角逐的目标，而土耳其治下的诸民族，又纷纷脱离土耳其而独立，于是土国国运就忽然转到困厄的地位，每与外国作战一次，它的领土与人口就缩减一次，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土耳其束缚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虽尚拥独立之名，而在实际上已无殊是列强的半殖民地了。一九〇八年在安佛尔领导之下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从事维新运动，用意本很良善，但因为操之过急，不但不能拯救土耳其，并且发生国际上最大的反响，使土耳其在国际地位更为削弱，但是民众的民族革命情绪，却弥漫全国，而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潜伏伟大力量。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发生以后，土耳其是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的，战事结束后，于一九二〇年君士坦丁堡与列强签订色佛尔条约，听凭列强的宰割，这时候土耳其已是名存而实亡了。

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崛起于小亚细亚，他在小亚细亚编练国

民军,创设国民党,成立国民议会政府,并且以鲜活的外交,精强的武力,打败了希腊军,收复失地,推翻色佛尔条约,另定洛桑条约,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民主共和国成立,推翻贪婪无能的苏丹,改良政治,提倡教育,增加军备,改革文字,解放妇女,十年间一切的措施,都已著有相当的成绩,而成为一个现代式的国家,跻于强国的地位,足为整个亚洲被压迫解放运动的光辉,近东的病夫,就这样恢复它的健康而隆盛了。

我们这样由历史上来看,土耳其与我国建国和复兴,是有很多相类的地方,除了土国建国的历史比我们要短些,民族人数要少些,单一民族所占的地域要小些而外,两国同样经过极光荣隆盛的时代,当苏力曼大帝朝恰像我们唐太宗的开拓疆宇的极盛时期,此后自十七世纪以后,君主昏庸,内政紊乱,外侮纷乘,恰像是我国近三百年来,受制于满清,尤其是后妃执政,宦官当权,更与清朝的西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任用宦官,枉杀大臣,移用海军建设费,修建颐和园,以极耳目之娱,是遥遥相对,这时候国家命脉,不断如缕,于是我国又应运而生,以超伦迈群的毅力,领导历史空前的伟大国民革命,经过十次失败终于把专制腐败的满清推到,树立了中华民国,使老大的中国构具了现代国家的型范。不过方才我说过,中国的历史是要比土国悠久些,疆土大些,那么伟大的革命,自然也非一蹴所可完成,所以我们国父终于在国内扰攘的氛围里赍志以逝,此后本党便本着国父的遗教,一息不懈的努力于革命建国的工作。由于事实的演进,和功业的彪炳,伟大的领袖蒋委员长,便为全国所拥戴而毅然继国父之后负荷起革命的重任。当我国刚刚完成真正的统一,从事更进一步的建国工作时,野心的日寇,乃不敢怠慢大发动“七七”事变,企图以武力令我屈服,以免我国扩大妨碍它的生存,这样就演成我们神圣自卫抗战的斗争,这也恰像希腊凭借英法的势力,来侵略土国是一样。但希腊的侵略战,由于土耳其国父的领导抵抗,并建新都于昂哥拉,终于再接再厉的把希腊战败,收复了失地,恢复了国威,而完成独立,造成近世弱民族自卫抗战的光荣记录。虽然我国尚停滞在与敌人艰苦抗战中。

我们这样检讨一下土耳其与我国的复兴历史,可以很明了的得到几个论断。

第一,凡是有文化的国家决不会灭亡,土国是突厥民族,突厥本是东方优秀民族,它们的文化在初期很受了我国文化的影响,夸大一点说,可以算我国文化一个支派——远东各国莫不皆然——以后到了小亚细亚近东深深受了回教文化的熏陶,与固有的文化相渗合,而成了近代土耳其的特质,在苏力曼大帝奖励学术文化之下,曾造成东方文化很高的境地。所以以后虽然疆土日减,国势日削,而土国文化并没有亡,土国民族之魂并未丧失这样形成它们全民族的向心力,而构成一种伟大力量,由于这种力量的鼓舞,终于克服当前的困难,恢复昔日的繁荣。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文化始终在潜流滋长始终没有中断或退步的,在这些古国之中,要算首屈一指,是远东各民族文化之保姆,伟大的气度,中庸的思想,王道的政治,再加上外来的回教,佛教文化的交流,形成中国文化的

特色,国父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一切革命建国的策略,行易知难的哲学,完全是中国固有文化而渗合西方文化的结晶,这样博大的文化,悠久的文明,除非我国自甘暴弃,自毁立场,我相信决不会偶然消失的,换言之拥有这样文化的我国,是绝不会灭亡的。由于土国的立国,更应当坚定我们的信念。

第二,凡是自卫抗战的国家决不会失败,土国自十八世纪后,由于当局的懦弱,以致引起多次的外侮,各属国纷纷独立,加以俄国的几次侵略,如在彼得大帝时,失掉阿速夫要塞、克里米亚、以及由高加索到多瑙河流域的土地,到了俄女帝喀得邻第二及亚历山大第一,联合奥匈各国,共同侵略,直到后来的希腊侵略,如火如荼的敌人,四面的环攻,几乎经过二百多年长的时期,假如土耳其若是采取不抵抗主义,恐怕今日的近东,不会有突厥人的足迹了,所幸历代土皇,都还能采取抵抗主义,在国内民气不至完全堕灭,在国外的敌人也就不能无所顾虑,因而才有最后的一战胜希的成功。至于我国除了宋、明两朝曾经演成历史上的灭亡——但满、蒙现在还是我国的固有成分——不过那并不是抵抗而灭亡,乃是由于不抵抗而灭亡,当时抵抗者是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一般少数的人,而不抵抗者是朝廷暨一般有实权的人,宋朝虽也实行迁都,但那是逃避,苟安,而不是进一步的积极抵抗,于是宋朝亡了。至于现在我们虽遭遇受敌人深入的侵略,但是自领袖,以迄全国军民,没有不抱着最大的敌忾,来参加救亡工作的,无耻的汉奸,却居少数,而且他们不但不为民众所姑容,就是他们玩傀儡的主人翁,也不表示信任,——汪逆所组织的伪府,至少未得敌方承认——。而我们全国上下仍于最高领袖领导之下再接再厉的进行抗战,并且发扬第二期三年作战计划我们再证以土国的自卫抗战成功,更应当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第三,多助的国家是不会失败,土国的战胜希腊,固然由于全民的努力,然而外交的运用,以及与国的帮助,却也有莫大的力量,因为彼时的希腊,虽然有英法两国的背景,但此后法国竟退出漩涡,而与土国签订弗兰克林,部隆协定,接着土国又与意大利成立协定,暗中又有俄国的支撑,于是土国的与国多了,而支持希腊的英军,也因法意两国撤退恰那克的驻军,也不愿与土作战,希腊成了孤立,自然敌不住抱着神圣自卫抗战必胜信念的土耳其了。至于我国所持的原则是自力更生,凭着我们无穷的人力和地力,固然足与敌人作长久的支持,但是与国还是我们多,因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以及所有反侵略的民族,没有不是同情于我们的,无论是在精神上或实力上,我们所得到的帮助,都是教敌人优厚,而敌人方面,则几乎全部的民主国家暨好和平反侵略的民族,没有不敌视它的,就是法西斯的国家,因为日寇的背约失信,也没有对它同情的了。日本在国际上,可以说是纯粹的孤立,对华的侵略,可以说是一味的横行。古语说:“得到{道}者多助。”以敌人的寡助,证之以土国的多助而获得胜利,我们更要坚定最后的胜利的信念。

再有，土耳其是一个回教国家，诚如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团员（Arnold J. Toynbee）说：“盖土耳其帝国文物制度的来源是有两个其一为中亚西亚草原游牧社会的文化，其二则为伊斯兰（Islam）的文明，”当此也有如我前面所说的多少有我国的文化渗合交流的成份，但它们在西亚细亚立国之后，几乎全部受了回教文明的陶冶，回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宗教，是一个爱和平反侵略的宗教，古兰经中曾有好多教人抵抗暴力的教训，穆圣的一生，几乎是一部和反动势力的奋斗史，回教是由艰苦奋斗中挣扎出来的，回教并不是教人消极无为，而是教人积极进取，因此在回教文化陶铸之下的土耳其民族，就不期而然的变成一种自强进取的特性，而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领率全世界的回教民族，垂数百年之久，其后国势陆危，内在的原因固由于苏丹的懦弱贪污，而外在的原因，就是欧洲列强，形成帝国主义的特质后，以谋在地中海及近东的发展为尤重要，这样的外来压力，是近代任何的没有形成或帝国主义的文明国度所难幸免的。而苏丹的贪妄，乃是违背了回教的精神，土国复兴后，虽然废除回教国的称号，并且部分的接受欧洲文明，实际上仍以回教文明为立国的骨干，现在又本着回教的爱好和平的精神，和近东的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成立协定，同时，与巴尔干各国密接地联系起来，结成南欧和近东和平柱石，这种成就是非常的大。这都受了艰苦自卫抗战所赐，我们应当和这些爱好和平反侵略的回教国际联系起来，共同向侵略者搏斗，来争取人类主义及世界和平的实现，在第二期三年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愿意以土耳其的复兴，来预祝我们的抗战胜利。

摘自《回教论坛》（重庆版）1940年 第3卷 第12期 第3—6页